

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



ONE HUNDRED BIOGRAPHYS
OF THE EMPERORS AND
EMPRESSES IN CHINA

中国皇帝皇后百传



耶律阿保机

远方出版社

2 100151 00 00 1111 106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

中国皇帝皇后百传



完 颜 阿 骨 打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

耶律阿保机

第 一 章	家族世系	(1)
第 二 章	壮大势力	(17)
第 三 章	夺取汗位	(38)
第 四 章	巩固汗位	(50)
第 五 章	建国称帝	(61)
第 六 章	南征北战	(90)
第 七 章	未竟之业	(121)
第 八 章	家庭生活	(142)

完颜阿骨打

第 一 章	崛起的女真	(147)
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 二 章	锋芒毕露	(154)
第 三 章	即位抗辽	(167)
第 四 章	“海上之盟”	(180)
第 五 章	金辽和战	(185)
第 六 章	金灭辽	(190)
第 七 章	谋交高丽	(224)
第 八 章	宋金之间的回合	(230)
第 九 章	金朝军制	(291)
第 十 章	抗金与叛金	(312)
第十一章	开国帝殒命	(324)



第一章 家族世系



在论及阿保机即位问题时，还应附带说说他的姓氏问题。《辽史》卷1《太祖本纪》一开头便写道：“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，姓耶律氏，讳亿，字阿保机”，似乎阿保机家族早就有姓氏，其实并非如此。《契丹国志》卷23《族姓原始》说：

契丹部族，本无姓氏，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，婚嫁不拘地里。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，始以王族号为“横帐”，仍以所居之地名曰“世里”著姓。世里者，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。（今有世里没里，以汉语译之，谓之耶律氏。）复赐后族姓萧氏。番法，王族惟与后族通婚，更不限以尊卑；其王族、后族二部落之家，若不奉北主之命，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；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，不拘此限。故北番惟耶律、萧氏二姓也。

《契丹国志》是采摘前人记载原文，排比成编的，这一条显然是出自赵至忠的《虏廷杂记》。《通鉴》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年末《考异》引《虏廷杂记》说：

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，始以王族号为横帐，姓世里没里，以汉语译之谓之耶律氏。赐后族姓曰萧氏。王族惟与后族通婚；其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，不得与





二部落通婚。

与此相类似的说法，还见于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72《四夷附录》，他在书中说：

至阿保机，稍并服旁诸小国，而多用汉人，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，作文字数千，以代刻木之约。又制婚嫁，置官号。乃僭称皇帝，自号天皇王。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，曰世里。世里，译者谓之耶律。

依欧阳修所说，契丹有姓氏乃始于创制文字之后。据《辽史》卷1《太祖本纪》，神册五年（920）“始制契丹大字”。这就是说，在此之前，契丹并无姓氏。

契丹人原来并无姓氏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还可以萧姓的起源为证。“萧”与“耶律”不同，如果说“耶律”是来源于契丹地名“世里”，那么，“萧”则与契丹地名无关，它是契丹人借用的汉姓，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灭晋以后才采用的。据《旧五代史》卷98《萧翰传》载：“契丹人东京，以翰为宜武军节度使。契丹比无姓氏，翰将有节度之命，乃以萧为姓，翰为名。”《契丹国志》卷17《萧翰传》也说：“翰始以萧为姓，自尔契丹后族皆称萧氏。”此外，《辽史》卷67《外戚表·序》也持类似说法：“大同元年，太宗自汴将还，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，赐姓名曰萧翰，以从中国之俗，由是拔里、乙室已、述律三族皆为萧姓。”而《新五代史》卷72《四夷附录》更谓“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，于是始姓萧”。以上关于契丹萧姓起源的各项记载，基本上是一致的，根据这些记载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契丹原来并无姓氏，其姓氏是仿照汉人风俗制定的。耶律虽然不是汉姓，或者确是地名“世里”的异译，但作为姓氏之被广泛使用，当亦是仿照汉俗。而且同样可以断定，在阿保机即汗位之前，他亦无姓氏。

宋人庞元英在《文昌杂录》卷5中记载：



余尝见枢密都承旨张诚一说，昔年使北辽，因问耶律、萧姓所起。彼人云昔天皇王问大臣云：“自古帝王英武为谁邪？”其大臣对曰：“莫如汉高祖。”又问：“将相勋臣孰为优？”对以“萧何”。天皇王遂姓耶律氏，译云“刘”也。其后亦赐姓萧氏。欧阳少师作《五代史》，乃曰天皇王阿保机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世里，世里译者谓耶律。昔萧翰为契丹大族，其号阿钵，本无姓氏，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，于是姓萧。二者不知孰是。

与“耶律”译为汉语即是“刘”相关的说法，还见于《辽史》卷71《后妃传序》：“太祖慕汉高皇帝，故耶律兼称刘氏；以乙室、拔里比萧相国，遂为萧氏。”这里说的是“兼称”，而不认为“耶律”译为汉语即是“刘”。“刘”在汉语中，除作为姓氏之外，并无其他含义，因此“耶律”译为“刘”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“兼称”说虽在道理上并非说不通，但在《辽史》及其他史籍中找不到实际例证。而《辽史》一书中，关于契丹族姓原始问题，之所以有互为矛盾的说法，是因为元朝修史时，本来就有陈大任与耶律伊两种辽史底本。陈大任在姓氏问题上赞同耶律与萧二姓同时产生的说法，故弃萧翰得姓的记载不取。《辽史》卷116《国语解》载：

耶律氏、萧氏：《本纪》首书太祖姓耶律氏，继书皇后萧氏，则有国之初，已分二姓矣。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，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。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，为宣武军节度使，其妹复为皇后，故后族皆以萧为姓。其说与《纪》不合，故陈大任不取。

由于萧姓始于萧翰得姓说，与《本纪》不合就弃而不取，显然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《辽史·太祖本纪》是根据后世追记的文献编定的。以后来产生的姓氏，冠诸初时，并不足以证明



契丹人原来就有姓氏。倒是被陈大任舍弃的说法更有根据。这种说法不仅有多种来源，而且与契丹人自己的说法也不矛盾。《辽史》卷 89《耶律庶成传》附庶箴转载其上表乞广契丹姓氏说：

我朝创业以来，法制修明；惟姓氏止分为二，耶律与萧而已。始太祖制契丹大字，取诸部乡里之名，续作一篇，著于卷末。臣请推广之，使诸部各立姓氏，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。

耶律庶箴建议以著于契丹大字卷末的乡里之名，广立各部姓氏，表明最初耶律氏的姓氏，确实是来源于该族居地的地名，不然，他当不会有此请求。

二

关于耶律阿保机的家世，据《辽史》卷 2《太祖本纪·赞》的简要记载，可制表如下：

雅里（始祖）——毗牒——颀领——罽里思（肃祖）——
萨剌德（懿祖）——匀德实（玄祖）——撒剌的（德祖）——
阿保机（太祖）

雅里又作泥礼、涅里，实皆一音之转。如前所述，他于唐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杀北平郡王、检校松漠州都督李过折，其借口为“过折用刑残虐，众情不安，故杀之”。然而，唐朝对于泥礼擅杀过折一事却极为不满。因为过折杀屈烈及可突于之后，即率众脱离突厥而归附唐朝，使契丹和唐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正如唐朝在敕书中所云：

敕契丹都督涅礼（即泥礼），往者屈（可）突于凶恶，无心忧矜百姓，背叛于我，将（终）日自防，丁壮不得耕耘，牛马不得生养。及依附突厥，而课税又多，部落吁嗟，卿所见也。李过折因众人之忿，诛



顽凶之徒，诸部落酋豪，相率归我，已令人随事赏赐，亦云且得安宁，过折封王，岂直赏功而已，亦为百姓众意，赖其抚存。

唐朝向以契丹王（可汗）为松漠都督。李过折被杀前，唐以他为松漠都督，故敕书中对泥礼称过折“是卿蕃王”。唐朝对泥礼擅杀过折确实不满，但是，为了维持同契丹的良好关系，仍不得不以泥礼为松漠都督，即承认他为契丹可汗。此事，玄宗是委幽州节度副使张守珪前去处置的，而且就此事敕守珪云：“顷者泥礼自擅，虽以义责，而未有名位，恐其不安，卿可宣示朝旨，使知无他也。”不过，泥礼似乎并不曾自为可汗，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把唐朝的加封当一回事，而仍与唐朝为敌。关于泥礼的活动，唐朝史料中至其擅杀过折即告中断，而十年后，即天宝四年（745）则云：“契丹大酋李怀秀降，拜松漠都督，封崇顺王，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。”至于怀秀与泥礼的关系，却未作任何交待。

辽以泥礼为阿保机始祖，史官萧韩家奴在兴宗时曾上疏追述这段往事。他说：

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注之后，国祚中绝；自夷离董雅里（即泥礼）立阻午，大位始定。然上世俗朴，未有尊称。臣以为三直礼文未备，正与遥辇氏同。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，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。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，尊四世为帝。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，乃制文字，修礼法，建天皇帝名号，制宫室以示威服，兴利除害，混一海内。厥后累圣相承，自夷离董湖烈以下，大号未加，天皇帝之考夷离董的鲁犹以名呼。臣以为宜依唐典，追崇四祖为皇帝，则陛下弘业有光，坠典复举矣。

关于辽追尊四祖及立庙，是后来的事情，这里仍从阿保机的始祖泥礼说起。据《辽史》卷63《世表》云：“泥礼，耶律



俨《辽史》书为涅里，陈大任书为雅里，盖辽太祖之始祖也。”“今以唐史、辽史参考，大贺氏绝于邵固，雅里所立则怀秀也。”雅里所立是否即是怀秀，《辽史·世表》的推断仍有待于更多的直接史料来证明，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，即雅里杀过折后，未曾自立为可汗，这在《辽史》多处记载中都是一致的。阿保机同族兄弟曷鲁就曾对他说：

在昔夷离堇雅里虽推戴者众，辞之，而立阻午为可汗。相传十余世，君臣之分乱，纪纲之统隳。委质他国，若缀旒然。羽檄蜂午，民疲奔命。由此看来，雅里杀过折后，并非不愿自取君位，而是由于契丹内部已陷入无休止的纷乱之中，他认为实不宜居此位，故立遥辇氏的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。

不过“相传十余世”的说法，却是不正确的，因为遥辇氏总共只传九世，即：洼可汗、阻午可汗、胡剌可汗、苏可汗、鲜质可汗、昭古可汗、耶濞可汗、巴剌可汗及痕德堇可汗。而阻午至痕德堇则为八世，雅里至阿保机为七世，阿保机与痕德堇同时。关于遥辇氏与耶律氏的世系，虽无更多的旁证，但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《辽史》中的有关记载。

萧韩家奴向兴宗建议追尊四祖并为之立庙时提到，阿保机的四世祖（即高祖）为朔烈，其父则为的鲁，而据《辽史·太祖本纪赞》记载，则分别是肃祖褥里思和德祖撒剌的。如果根据这种歧异而判定其中哪一记载是错误的，却也是没有足够的根据的。古代各民族，都把熟记家世作为一项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教育内容，在有文字记载以前，尤其如此。所以，包括萧韩家奴在内的辽朝历代史官，在这类问题上是不大可能发生错误的。这种记载上的不一致，很可能是由于契丹人本来就存在一人数名的情况。例如阿保机小字又曰“曷里只”；共同族兄弟曷鲁字“控洪”、又曰“洪隐”；而其妻弟萧敌鲁则又称“敌辇”。据此，我们只能推断朔烈和敌鲁分别是褥里思和撒剌的的别名。



耶律氏自其始祖雅里直至阿保机即汗位前，世代为迭刺部夷离堇。如前所述，唐五代时，契丹可汗统八部，每一部的首领皆称俟斤，即夷离堇。夷离堇“犹中国刺史”，故《五代会要》卷29《契丹》又云：“其八族长皆号曰大人，称刺史。”然而，当时的契丹八部中并不包括迭刺部。据《辽史》卷32《营卫志·部族》载：“当唐开元、天宝间，大贺氏既微，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。时契丹因万荣之败，部落凋散，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。涅里所统迭刺部自为别部，不与其列。”

有人以为屈烈即是阻午可汗，而可突干“大致可以考定为雅里”。这一判断是不能成立的。《通鉴》卷214明确记载，屈烈和可突干都是为张守珪遣王悔唆使李过折杀害的，并于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十二月乙巳传首东都，而过折复于第二年为涅礼（即雅里）所杀。这说明可突干和雅里绝非同一人。问题仅仅在于，辽虽以雅里为始祖，但除《辽史》中的简略记载之外，并无其他旁证。

自可突干和雅里的时代起，契丹内部就围绕着是否要脱离唐朝而自立的问题，展开了尖锐的斗争。看来，雅里及迭刺部历代的夷离堇都是倾向于摆脱唐朝的控制而自立的。据《辽史》卷71《玄祖简献皇后萧氏传》载：“玄祖为狠德所害，后嫠居，恐不免，命四子往依邻家耶律台押，乃获安。太祖生，后以骨相异常，惧有阴图害者，鞠之别帐。”玄祖即阿保机祖父匀德实，他身为夷离堇，凭借迭刺部的强大武力，是契丹八部真正的实权人物。所以，“耶律狠（狠）德等既害玄祖，暴横益肆”。这就是说，当匀德实在世的时候，狠德等并不敢如此猖狂。所谓阿保机“骨相异常”云云，只表明其祖母对他寄以的厚望，希望他将来继承其祖父的遗志，在契丹八部中建立起更大的权威。

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（872），其父撒刺的后被迫尊为



德祖宣简皇帝，母巖母斤被追尊为宣简皇后。撒刺的有兄弟四人，排行第四。阿保机出生时，他的二伯父巖木任迭剌部夷离堇，三伯父释鲁为于越。于越是契丹“贵官，无所职。其位居北、南大王上，非有大功德者不授”。而释鲁在契丹人中间尤其威望。他贤而有智，原先遥辇氏可汗岁贡于突厥，“至释鲁为于越，始免”。阿保机幼年时常与族兄弟耶律曷鲁在一起，当时释鲁即非常看重这两个少年，曾郑重其事地表示过对他们的看法，他说：“兴我家者，必二儿也。”阿保机果然不负祖母及伯父所望。成年后，“身長九尺，丰上锐下，目光射人，关弓三百斤”。在当时，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超人的体力，再加上练就的一身好武功，这些都是在部族社会中建立威望的基本条件。阿保机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受到大家的爱戴。他与曷鲁互易裘马，建立了很深的友谊，而曷鲁对他则格外尊重。

于越释鲁活了 57 岁，为其子滑哥所杀。这显然是为某种势力主使的政治谋杀，对此，阿保机不仅充分估计了斗争的复杂性，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对策。他对曷鲁说：“滑哥弑父，料我必不能容，将反噬我。今彼归罪台晒为解，我姑与之。是贼吾不忘也！”看来，滑哥弑父，目的就是要夺取部族的权力，因此，必然要与释鲁选定的新一代掌权者阿保机和曷鲁等人发生冲突。但是，当敌人气焰嚣张之时，阿保机却能不动声色，镇定自若。这正是他常能在复杂的斗争中，战胜对手的非常可贵的品质。而易鲁从此以后，则经常执刀护卫阿保机，以备不虞。后来，曷鲁父偶思病危时，也表示了与于越释鲁一致的观点，他握着阿保机的手说道：“尔命世奇才。吾儿曷鲁者，他日可委以事，吾已谕之矣。”这位偶思，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，其父匡马葛即是阿保机祖父匀德实之兄，他本人也曾担任过夷离堇。可以说，很早以来阿保机就是迭剌部大权在握的老一辈亲自选定的接班人。他初为挾马狝沙里。“挾马”是护卫首领的侍从，“沙里”即“郎君”，是契丹人对贵族青年通常



使用的称呼。从阿保机的官称即可看出，其时，契丹首领的侍卫精兵即在他掌握之下。他曾命曷鲁率数骑召来小黄室韦降附，此即后来的突吕不室韦的一部分。他与曷鲁真可说是配合默契。凡军国大事，皆二人商议而后行，而曷鲁在征战中则往往为阿保机充当先锋。例如在征讨越兀及乌古的过程中就是这样。

由于阿保机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唐天复元年（901），遥辇氏痕德堇可汗以他为“大迭烈府夷离堇”。所谓“大迭烈府，即迭剌部之府也”。

三

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、虏掠，历代皆然，契丹亦不例外。唐末，中原战乱频仍，这就更使得契丹有机可乘。《旧五代史》卷137《契丹传》载：

光启中，其王钦德者，乘中原多故，北边无备，遂蚕食诸郡，达靺、奚、室韦之属，咸被驱役，族帐寝盛，有时入寇。刘仁恭镇幽州，素知契丹军情伪，选将练兵，乘秋深入，踰摘星岭讨之，霜降秋暮，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，马多饥死，即以良马賂仁恭，以市牧地。

光启（885～888年）是唐僖宗年号，当其末年，阿保机已年届十七八岁，亦参与了征服奚、室韦的战斗。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，据《旧五代史》卷135《刘守光传》记载，这是唐昭宗乾宁元年（894）的事。刘仁恭虽然设法打击、削弱契丹的实力，但“入寇”之事，仍时有发生。三年（898），罗弘信与李克用开战，克用“征兵于燕，仁恭托以契丹入寇，俟敌退听命”。而此时契丹南下侵扰的事件，即有阿保机参与。《辽史·太祖本纪》记事始于唐昭宗天复元年（901），故阿保机参与过



的早期南下掠夺战争，均不见记载。

掠夺“生口”（奴隶），是契丹南下侵扰的主要目标之一。天复二年（902）七月，阿保机“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，攻下九郡，获生口九万五千，驼、马、牛、羊不可胜纪。九月，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，始建开教寺”。这说明，早在阿保机即汗位以前，他南下俘掠生口的战争即已达到很大规模。从事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汉人，“城郭以居”，世代过着定居生活，不同于“车马为家”的契丹人。阿保机把他们俘掠到塞外，并未能改变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，否则，他们无法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，这对契丹贵族还有什么好处呢？阿保机建龙化州，目的正是为了安置被俘的汉人。关于此事，《辽史》卷37《地理志·上京道》亦载：

龙化州，兴国军，下，节度。本汉北安平县地。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，称龙庭。太祖于此建东楼。唐天复二年，太祖为迭烈部夷离董，破代北，迁其民，建城居之。明年，伐女直，俘数百户实焉。天祐元年，增修东城，制度颇壮丽。

两汉有西安平，王莽时曾一度改称北安平，属辽东郡，但与阿保机所置龙化州地望不合。辽龙化州在今内蒙古奈曼旗北，东临敖来河。另外，阿保机也确实在前代已设州县并有汉人居住的地方安置过汉人。例如柳城（今辽宁朝阳），在唐，“本辽西郡，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，圣历二年侨治渔阳，开元五年又还治柳城，天宝元年更名”。“后为奚所据。太祖（阿保机）平奚及俘燕民，将建城，命韩知方择其处。乃完葺柳城，号霸州彰武军，节度。”关于阿保机“平奚及俘燕民”事，在《辽史·太祖本纪》中，多见于后梁开平元年（907）继汗位之前。所以，他以所俘燕民建柳城并号霸州彰武军，亦当在此期间。至于奉命完葺柳城的韩知方，与辽著名汉臣韩知古仅一字之差，有人怀疑是同一个人，是有道理的。《辽史》卷





74《韩知古传》载：“神册初，遥授彰武军节度使。”其实，韩知古被安置在柳城，是神册建元很早以前的事。《韩椅墓志》有“获桑野之媵臣，建柳城之冢社”的记载即可证明，韩知古被俘后即被安置在柳城。其孙韩瑜及瑜之子韩椅墓志均出土于古柳城（朝阳）一事，更证明韩氏一族自入辽以后即定居于此。

这些安置被俘掠汉人的居民点，即是契丹境内的汉城。汉城亦即《辽史》中所记载的“头下”。契丹贵族都竞相以所俘汉人建汉城、头下，因为头下是这些契丹贵族的私产，而其中的汉人，最初则都是契丹贵族的私奴。当时，契丹正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阶段，“头下”中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，这对于契丹传统的游牧和渔猎经济来说，不仅意味着量的简单增长，而且是社会分工的扩大。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商品交换和私有制的发展。由于“头下”是新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，所以契丹贵族拥有的头下越多、规模越大，也就表明他占有的人力、物力资源越多，实力越强。耶律阿保机一族长期充当部族的军事首领，俘获独多，因而，他拥有的头下不仅大而且多，最后，他正是靠了这些人力和财富，统一了契丹各部。

《新五代史》卷72《四夷附录》记载了关于阿保机的这样一个传说：

阿保机，亦不知其何部人也，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。是时，刘守光暴虐，幽、涿之人多亡入契丹。阿保机乘间入塞，攻陷城邑，俘其人民，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。汉人教阿保机曰：“中国之王无代立者”。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。其立九年，诸部以其久不代，共责诮之。阿保机不得已，传其旗鼓，而谓诸部曰：“吾立九年，所得汉人多矣，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，可乎？”诸部许之。汉城在炭山东南滦





河上，有盐铁之利，乃后魏滑盐县也。其地可植五谷，阿保机率汉人耕种，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，汉人安之，不复思归。阿保机知众可用，用其妻述律策，使人告诸部大人曰：“我有盐池，诸部所食。然诸部知食盐之利，而不知盐有主人，可乎？当来犒我。”诸部以为然，共以牛酒会盐池。阿保机伏兵其旁，酒酣伏发，尽杀诸部大人，遂立，不复代。

因为这是一个传说，所以，其中所记时间不可过于拘泥。如依上引这段文字开头所云“是时，刘守光暴虐，幽、涿之人多亡入契丹”来判断，阿保机建汉城一事，应发生在刘守光为燕帅（907年）之后，而朱温代唐和阿保机即汗位，也都发生在同一年，因此，汉城事也应是在阿保机即汗位之后。然而，欧阳修却把此事排列在“梁将篡唐”之前。而《通鉴》卷268虽系此事于开平元年（907）五月，但却是倒叙阿保机即汗位之前的事情。而且同卷胡注还引用了《汉高祖实录》和《唐余录》，这些书所记此事发生的时间更早：

僖、昭之际，其王邪律阿保机怙强恃勇，距诸族不受代，自号天皇王。后诸族邀之，请用旧制。保机不得已，传旗鼓，且曰：“我为长九年，所得汉人颇众，欲以古汉城领本族，率汉人守之，自为一部。”

诸族诺之。俄设策复并诸族，僭称皇帝，土地日广。契丹境内的“汉城”最早始于何时，虽很难做出确切回答，但阿保机即位前后，汉城曾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，并成为其夺取政权的“资本”，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。

阿保机立国前后，契丹贵族广泛建立汉城，这种汉城又往往与头下制度联系在一起。据《辽史》卷37《地理志·上京道》载：

头下军州，皆诸王、外戚、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，或置生口，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。横帐诸王、国

